

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变化的国际根源

杨洪贵

(重庆文理学院 法律与政治系,重庆 永川 402160)

[摘要]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美国与南非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在澳大利亚产生强烈反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仅直接关注澳大利亚种族问题,而且成为土著活动家争取种族平等的渠道与场所。这一切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带来强大的国际压力,成为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国际根源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07)03-0037-04

作为一个由英国殖民地发展而来的有着长期种族主义历史的国家,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改变国内种族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代,英国和印度曾经成功地迫使澳大利亚政府改变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印度人的法律地位^{[1][22]}。二战后,随着反种族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国际社会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压力,促进了澳大利亚种族政策的转变。1962年,联邦选举法案正式把联邦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土著人,同年西澳赋予土著选举权;1965年,昆士兰把选举权扩大到土著人;1966年,联邦仲裁法庭宣布北方领土养牛场的一些土著工人获得与白人同样的工资待遇;1967年,澳大利亚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宪法第51条26款,赋予联邦对全国土著的管辖权,废除宪法第127条,规定将土著人口计入澳大利亚联邦人口统计之内,从而彻底改变了土著的宪法地位。本文拟就促进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演变的国际根源进行简要评述。

一、美国和南非民权运动发展在澳大利亚产生强烈反响

1950~60年代,美国产生了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60年代初达到高潮。同时,在种族隔离的南非,黑人的斗争也开始展开。美国民权运动与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在澳大利亚得到广泛的报道,引起了深切的关注,澳大利亚人积极行动起来予以声援。1960年3月21日,南非爆发了反通行证法的群众运动,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佩维尔镇和开普敦附近的兰加镇集会示威的数万名非洲群众遭到当局血腥镇压,导致死70多人、伤200多人的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21]。惨案发生后,悉尼的

大学生们举行了几次集会与抗议活动;1963年,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贸易博览会期间,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的学生们在南非展厅前举行抗议,反对种族隔离;1963~1964年夏天,南非板球队前来澳大利亚南部参加比赛,当地大学生、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人员在机场和板球比赛场地进行抗议^{[3][1]}。

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提出一项民权法案,宣布就业领域和公共场所实施种族歧视为非法,授权联邦政府废除地方学校的隔离制度,确认黑人的选举权。同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总统继续推进民权运动,促进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但来自美国南方的参议员试图阻止法案的通过;1964年5月6日,为了支持美国通过民权法,悉尼大学2000多名学生聚集在悉尼的美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大约50名学生在街道中间静坐示威,反对美国南方的参议员阻挠肯尼迪提出并为约翰逊总统坚持的民权法案。警察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50多名参加抗议的学生被逮捕。此次在悉尼美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成为全世界各家报刊的头条新闻,给美国参议院很大的压力^{[3][18-9]}。

澳大利亚为美国与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声援运动激发了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种族问题的高度关切和对澳大利亚种族政策的质疑。1964年7月10日,斯里兰卡锡兰观察家报(Ceylon Observer)登载题为“奇怪的反应”的评论。评论指出,仔细考察澳大利亚的种族状况,就会觉得澳大利亚人声援美国民权运动显得荒唐可笑。就在这个抗议美国黑人政策的国家,绝不允许任何有色人种移民进入,而我们锡兰的有色人种兄弟甚至可以去美国并

* [收稿日期] 2006-12-23

[作者简介] 杨洪贵(1970-),男,四川南充人,副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研究。

以美国为家,只要我们愿意的话。但是澳大利亚呢,回答是绝对的,“No! 那些抗议者应该环顾一下自己的家乡,看看是否存在有色人种邻居。如果示威者深入考察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在自己的社会里存在着他们所反对的那种种族歧视,而且还非常严重。我所指的是澳大利亚如何对待自己的土著。美国生活杂志有文章评论到,悉尼大学的学生仅仅为美国的种族歧视而抗议! 世人皆知,澳大利亚自己存在世界上最严厉的种族排斥法。一位美国黑人在给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的信中写到,首先感谢澳大利亚学生们的声援。但接着转而问到,如果你们的关心出自内心深处真诚的的话,我冒昧地问你们一句,你们能不能凭借发自内心的同情和良知发动和平抗议,反对你们澳大利亚国内的种族歧视呢?”^{[3]P8-9}

澳大利亚人如此投入地为美国和南非的黑人权利而抗争,为什么不关注自己国内的种族问题,为土著和有色人种移民的权利而斗争呢? 国际社会的质疑深深地刺痛了澳大利亚人的神经,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关注自己的土著状况和种族歧视问题。1964年5月2日,澳大利亚著名人类学家彼尔·斯泰勒(Bill Stanner)给悉尼先驱晨报写信指出:“事实表明,澳大利亚人仅仅为遥远国度的种族问题而愤怒。”^{[3]P1} 1964年5月抗议后,5月11日,有人给悉尼先驱晨报写信说到:“学生们的勇气值得钦佩,但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澳大利亚的土著所处的困境。他们加入人群高喊口号谴责其他国家的种族主义的时候,却自欺欺人地宣称自己在为有色人种的权利事业而斗争。而以一种建设性方式帮助我们社会倍受剥夺的土著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些示威者有多少与土著交往过呢? 有多少人会邀请一位土著人到自己家里做客呢? 有多少人考虑过与一个澳大利亚有色人种血统的人结婚呢? 只有当所有澳大利亚人停止对土著人的歧视,不再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把他们毫无保留地接纳进白人社会的时候,学生们才有可能正大光明地为其他国家的种族歧视举行抗议,而不被指责为伪善,才显得理直气壮!”^{[3]P9}

南非和美国南部种族关系的严重恶化,使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意识到顽固坚持种族主义所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他们越来越厌恶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4]P20} 由此,全社会开始更加关注土著问题,成为促进种族政策转变的基础。

二、澳大利亚的土著活动家们利用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施加压力

二战后,澳大利亚土著争取权利的斗争逐渐发展。土著活动家们不断向国际社会揭露澳大利亚政府的种族政策,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坛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施加压力。查尔斯·迪吉(Charles Duguid)是最早认为可以把联合国作为公开揭露澳大利亚土著处境的论坛的土著活动家。1951年,他在由维多利亚土著权利理事会于墨尔本组织的一次集会上面对数千听众发表演讲,呼吁联

邦政府依据联合国宪章结束种族压迫,授予土著充分的人权。1952年,查尔斯·迪吉编辑了一份反种族政策的宣传材料,在其中他逐条地分析了《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的内容,并指出澳大利亚政府的土著政策是如何违犯相关条款的。他呼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本着“人类共有诚实”,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原则运用于土著人,并警告澳大利亚政府:“亚洲各国和人民正拭目以待”^{[1]P24};另一位土著活动家玛丽·贝内(Mary Bennett)也在1957年出版《澳大利亚土著权利》一书,全篇引用《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的条款进行注解,利用国际舆论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施加影响^{[1]P24}。

著名土著事务活动家热西·斯特雷特(Jessie Street),这位长期鼓吹把政治权利扩大到土著的活动家,也热心利用国际社会来展开活动。热西·斯特雷特是早期土著进步组织的重要人物,他与基地在伦敦的反奴隶制协会有着密切联系,并通过该协会与联合国接触。1950年代,英国反奴隶制协会开始采取积极行动追究澳大利亚土著问题。1956年,反奴隶制协会起草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提交了一封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无法享有公民权的申诉信^{[1]P25}。1957年,热西·斯特雷特提出了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地位的报告,成为国际社会经常批评澳大利亚的依据^{[1]P24}。他还希望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人权委员会直接申诉澳大利亚土著的人权问题,但遭到多方阻挠。为更好地公开揭露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政策,后来他极力主张在澳大利亚建立全国性的联邦土著权利机构以便与联合国直接接触^{[5]P500-581}。他的主张得到了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响应。肖勒·安德烈(Shirley Andrews)也热心于建立一个澳大利亚的代表机构向联合国提出澳大利亚种族歧视问题,而不是依靠海外机构如英国的反奴隶制协会。后来他成为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的早期成员之一。正是为了促进土著组织在与联合国交涉中进行行动协调,1958年2月,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FCAA)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各州土著进步组织的代表。在理事会最早的声明里号召:给予土著与其他澳大利亚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废除所有联邦与各州歧视土著的法律^{[1]P25}。1960年代后,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成为澳大利亚土著权利运动的核心组织。全国性土著权利机构的建立为澳大利亚土著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提供了方便,经过长期努力,1969年,澳大利亚土著代表团最终到达纽约,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澳大利亚土著现状报告。

此外,澳大利亚土著组织还利用国际劳工组织(ILO)就土著就业与生存问题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要求各国政府应该保证土著居民“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全国性法律和规定赋予全国其他人口的权利和机会”^{[1]P23}。同年,国际劳工组织还通过《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土著民族就业的107号公约》,指责澳大利亚牧业土著工人的低工资政策直接违背该公约的相关规定。澳大利亚拒绝签署这些国

际文件,但为 1958 年成立的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关注土著就业问题提供了依据;1959 年,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号召其成员带上国际劳工组织的《土著与部落人口公约》参加州和联邦议会,给政府施加压力^{[1]P25};1962 年,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领袖之一肖勒·安德烈编写的理事会年度参考资料中对土著就业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揭露。他指出,澳大利亚对土著普遍实行低工资政策,尤其是北方领土、昆士兰和西澳的畜牧业特别严重,而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都对土著的工作机会进行限制;1963 年,国际劳工组织召开年会,澳大利亚的土著工资问题即将面临国际劳工组织的审查和批评。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被迫采取行动,于 1963 年 9 月的大会上通过支持牧业土著工人获得平等工资的决议^{[3]P15},从而为 1966 年联邦仲裁法庭宣布北方领土养牛场的土著工人获得与白人同样的工资待遇奠定了基础。

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为迫使澳大利亚改变种族政策的重要力量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大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二条规定:“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他种主张,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他种身份。”^{[6]P203}联合国人权基本原则的确立推动了国际社会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步伐,促进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澳洲黑人的命运。1945 年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被列入“种族主义阵营”;1949 年,苏联代表团团长 A. 维辛斯基在联大特别政治会议上揭露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暴政和土著的悲惨状况,呼吁国际对其进行关注^{[7]P35};1952 年,联合国大会总委员会则把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与南非种族隔离相提并论,一起列入议程,在大会上受到同声谴责。一些非洲国家把澳大利亚说成是“亚洲的南非”^{[8]P197}。同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敦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重新审视自己的种族政策。时任总理孟席斯写信给土著居民较多的昆士兰政府,要求他们考察当地种族问题的状况。昆士兰总理在回信中辩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文化落后,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没有资格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存在,也不符合联合国确定的少数民族标准,无权享有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的相应权利^{[1]P23}。

进入 1960 年代后,随着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和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发展,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批评日益加剧,澳大利亚对土著居民的歧视,以及基于种族原因对有色人种移民进行限制的“白澳政策”遭到激烈的批评与攻击。1960 年 11 月 13 日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的《殖民地人民独立宣言》的提议得到大会的支持。赫鲁晓夫在提案中指责澳大利亚灭绝土著人的种族政策,他说:“任何人都知道,澳大利亚土著人口是以何种方式灭绝。”1963 年 6 月,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会议上,苏联代表直接批评澳大利亚代表,指出澳大利亚的宪法第 127 条(内容为:在统计联邦、州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口时,土著

居民不得计算在内)就是歧视土著人的最好证据^{[3]P14}。同年 11 月 20 日,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宣言》,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形成了空前的压力。因为此宣言不仅重申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的原则,而且宣称有必要尽快消除各种歧视,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尽快采取措施消除世界各地的各种形式的歧视行为。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国家,澳大利亚开始意识到国际舆论成为促进各国实施联合国非歧视的人权原则的力量。因此,澳大利亚被迫成立一个政府部门兼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考察种族歧视问题。1964 年 3 月,该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为了确保澳大利亚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不受严重的伤害,我们必须尽可能立即切实地废除澳大利亚社会的种族歧视^{[3]P15}。顺应潮流,1965 年澳大利亚签署了《关于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

澳大利亚签署联合国相关公约后,国际对澳大利亚实施公约的状况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宪法的第 51 条 26 款和第 127 条成为国际社会进一步批评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的口实。第 51 条 26 款规定,为了维护联邦的安宁、秩序,促进联邦对国家的良好治理,联邦议会拥有对各州土著以外任何种族的居民制定特别法律的权力^{[9]P216-21}。1965 年,孟席斯政府提出废除宪法第 127 条的提案。当时,总理孟席斯在议会里说:“宪法第 127 条与我们国家的形象完全不协调。”^{[10]P270}1967 年 5 月 26 日,总理霍尔特在呼吁选民支持改革的讲话中说道:“除非我们对宪法改革表示支持,否则就会破坏澳大利亚形象和声誉,使世界各地渴望公正的人们对澳大利亚另眼相看。”^{[10]P273}为了缓解国际社会的压力,消除国际社会谴责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口实,孟席斯和霍尔特政府推动宪法改革,并在 1967 年通过全民公决废除和修改有关宪法条款,实现土著宪法地位的改变。

总之,随着战后澳大利亚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土著政策成为澳大利亚参与国际交往的重大障碍。在冷战格局下,“当澳大利亚充当美国的伙伴为美国对抗苏联而呐喊助威时,才发现自己由于对土著的不公正而处于尴尬之中。同样也由于种族主义名声而影响与北方近邻的交往”^{[11]P125}。其国际影响力也大打折扣:“在种族主义被明确地归类为一种疾病的世界上,澳大利亚因为它的白澳政策而背有种族主义的坏名声。我们参加国际上的讨论,提高我们的嗓音时——在保卫人权,维护人类福利方面,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我们的发言由于整个大陆遍布着成千上万蜷缩在垃圾堆上的被歧视、被压迫的人民而变得一文不值。”^{[12]P105}国际社会给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形成的巨大压力是澳大利亚种族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John Chesterman. *Defending Australia's Reputation*,

How Indigenous Australians Won Civil Rights (part one) [J].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2001, 32(116): 20 - 39.

[2]余建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兴废[J]. 史林, 1997(2).

[3]Ann Curthoys. *Freedom Ride, a freedom rider remembers*[M]. Allen & Unwin, 2002.

[4](澳)戈登·福斯. 当代澳大利亚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5]Marilyn Lake. *Citizenship as Non - Discrimination: Acceptance or Assimilationism? Political Logic and Emotional Investment in Campaigns for Aboriginal Right in Australia, 1940 to 1970*[J]. *Gender & History*, 2001, 13(3): 566 - 592.

[6]周勇. 少数人权利的法理: 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权利的国际司法保护[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苏)C. A. 托卡列夫, C. H. 托尔斯托夫. 澳大利亚

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上)[M]. 李毅夫, 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0.

[8]金淘, 孙运来. 世界民族关系概论[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9]Helen Irving. *To constitute a n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Australia's constitu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Bain Attwood, Andrew Markus. *The 1967 Aborigines Referendum and All that: Narrative and Myth, Aborigines and Australia*[J].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1998, 29(111): 267 - 288.

[11]Michael C. Howard. *Ethnicity and Nation - building in the Pacific*[M]. Tokyo: United National University, 1989.

[12](澳)唐纳德·霍恩. 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M]. 徐维源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O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Australian Racial Policy after the World War

YANG Hong - gui

(Department of Law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 the shift of Australian racial policy ha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s. American civil movement, South Africa apartheid, the U. N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ve brought pressure 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become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Australian racial policy.

Key Words: post - war; Australia; rac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上接第 27 页)

[参考文献]

[1]江帆. 民间口承叙事论[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2003.

[2]刘守华. 比较故事学论考[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Study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nheriting Folktales in the Proje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ANG Zhi - qi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ctating status quo and the predicament of inheriting folktales by quoting the tales dictated by the interviewee, Tan Zhen - shan. Therefore, it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nheriting folktales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periment of "dictating stories to the story tellers and constructing the story telling context". In this way, it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suggestions to get rid of the predicament.

Key Words: Tan Zhen - shan; folktale; inheriting; development strategy